

烽火年代的呼唤

—《救亡日报》史话

高 宁 著 重庆出版社



烽火年代的呼唤

——《救亡日报》史话

高 宁 著

重庆出版社

1988年·重庆

责任编辑：何鸿钧

封面设计：闵 翔 熊 克

技术设计：忠 凤

高 宁 著

烽火年代的呼唤——《救亡日报》史话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插页4 字数136千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

*

ISBN 7-5366-0492-0
G·207

定价：1.60元

抗 救
戰 亡 日 報
到 底

宋慶齡

宋庆龄为《救亡日报》题词

救亡報
 緬綸家宜毀臉免令可捐人
 能以大義我何用惜人無能
 一上田
 拙上田報救不若雲煙更重
 一上田
 七

上海市文教界亡報救
救亡日報
 第四本訂合日十輯
 目要

特稿	社論	其他
陳誠將軍告官兵書	田漢論應如何盡擊出雲飛	由林摩王任
陳銘樞將軍談戰局	宋慶齡致英國工黨書	胡風王任
張發奎將軍命見記	謝冰心代表兩方將士呼籲	范明政王任
我們要保衛山西	敵軍皇子司令重傷	王任
應否對日絕交宣戰		

救亡日報
 上海市三六號黃浦大道京南號

一九三九年六月《救亡
 日報》为救济重庆被炸难
 难义演，翠屏寺题词声援。

救亡日報

我敵在南不對付

北犯敵力籠守武昌

軍民協力籠守武昌

須賜狂

先生雖遠氣常存

國民反桂南

桂南各處反桂

上海物價近來暴漲

白木每根至四十元

大敵再犯牛條山



新文軍捷報頻傳

總司令長孫仲榮

譴責鄧邦衡促進憲政

資糧船今日飛歸聯

桂南各處反桂，桂南各處反桂

桂南各處反桂，桂南各處反桂

桂南各處反桂，桂南各處反桂

桂南各處反桂，桂南各處反桂

桂南各處反桂，桂南各處反桂

桂南各處反桂，桂南各處反桂

1939年，《救亡日报》部分同志摄于桂林白面山松林。



1985年，夏衍、廖沫沙同志与李一氓同志（左二）
张光年同志（左一）在一起。



1980年《救亡日报》部分同志在北京中山公园合影。
前排中为夏衍同志。

6240966
26

序

廖沫沙

几年前，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来找我，要我谈谈抗战期间我在《救亡日报》工作的情况。她正在搜集资料，准备写一篇以《救亡日报》为题的硕士论文。那次，我同她谈了大约两个小时。

现在，这位女研究生已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了。她利用业余时间将她在写论文期间搜集的材料写成了一本书，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愉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说老实话，以我现在的健康状况，我不可能细看这部十几万字的书稿了，所以只能看看提纲和部分章节。但是，对《救亡日报》我是不能忘怀的，在《救亡日报》一起共过事的那些同志们我也是不能忘怀的，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回忆起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所以，我很高兴有人为他们作传，也很乐意为这样的“传”写几句序言。

《救亡日报》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创刊后在上海很有影响。上海沦陷后，曾暂时休刊，以后迁到广州，广州沦陷又迁到桂林，直到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被迫停

刊，始终是国统区的一面旗帜。它与《新华日报》、《群众》等党报党刊密切配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为发展和壮大各方面特别是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团结、争取和教育广大群众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同《救亡日报》的关系是从桂林时期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三进三出”。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我同周立波同志先后从长沙到了桂林，立波同志曾帮《救亡日报》编了一个短时期的报，我给报社写过一些文章。后来被人拉回湖南编《开明日报》。这一进一出时间很短。二进《救亡日报》是一两个月以后，大约一九三九年八月底九月初。这回是报社通过田汉找我，因为周立波去延安了，要我去接替他。我到报社时，总编辑夏衍不在桂林，到香港筹款去了。我编新闻版，兼写社论、时评。那时，报上需登大量的战事新闻和军事评论文章，经常的撰稿人有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张铁生等，但稿件还嫌不够。我读过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现在看来，当然很可笑，无非是《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然，在长沙时，我就读过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再加上小时候读过的旧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志》之类，总算懂得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战略、战术、战役、战斗，也记住了若干战例。我就用这点知识写了一些军事评论，既评论中日战争，也评论欧战形势。不想这些文章在《救亡日报》发表以后，竟引起了一位集团军总司令的注意，他以为我是学军事的，竟通过李克农同志正式要我去当了他的秘书。这位将军就是黄琪翔。这样，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

二次离开《救亡日报》。

我在襄樊前线黄琪翔的总部呆了将近一年。在夏衍的要求下，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又回到报社。这一次，我本来是打算安营扎寨的，谁知只过了三个月，由于我们拒登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电稿，终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不久，我们就陆续离开桂林，撤到香港。

算起来，我在《救亡日报》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半年，那么，为什么我常常回忆起这张四开四版的小报呢？

首先，是同志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如同家人般的和谐气氛。夏衍同志那时已是著名的戏剧家兼社会活动家了，但他大家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并无“权威”架子的敦厚的兄长。工作上，大家相互支持，相互体谅，生活上，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虽然生活很清苦，没有工资，没有津贴，有时还不免饿肚子，但从未发生过相互埋怨的事。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救亡日报》这个大家庭出来的人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没有一个颓唐，没有一个落伍，这是值得欣慰的。

其次，是一种不计私利的精神。那时候办报，编辑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大家的精力都是那么充沛。记者白天跑新闻，回来就写稿，有时一天写三四条，天天如此。当新闻编辑的每天晚上钻到郊区白面山岩洞傍的小屋里，一边编稿，一边做标题、组版，每天都要忙到早上五点钟才能休息，白天还得写评论。夏衍同志除了编报，还要写剧本，有时半天办报，半天把自己锁在屋里写剧本，《心防》、《一年间》、《愁城记》都是那时写的。汉代贾谊说过这么一句

话：“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元代张养浩也说过：“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看来，正是这种“为公”“忘私”，也就是为拯救民族危亡、抗击异族侵略的高昂的精神动力，支持着《救亡日报》同人忘我地工作。我想，这种“为公”“忘私”的精神在今天还是应当大大提倡的。

《救亡日报》作为一张统一战线的报纸，在办报方针、办报技巧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经验，比如怎样既忠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尽可能与友党友军保持友好关系；既不在原则问题上丧失立场，又在一般的枝节问题上机动灵活，这是很需要动一点脑筋的。目前，我们在争取实现民族统一大业的情势下，这些宣传上的经验也仍然值得借鉴。

这些年，《救亡日报》的一些同事陆续发表了不少回忆当年战斗生活的文章，有些我读过，感到很亲切。现在，我又一次产生了这种亲切感，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当年《救亡日报》颇为活跃的女记者高汾同志的女儿。我想，其他的老同事读到它，也会产生这种感觉吧。

拉杂写来，权作本书的序文。

引　　言

一九三七年，是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一年。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和考验。

一九三七年，是战鼓与军号交鸣、激情与热血沸腾的一年。中国人民选择了团结奋斗、救亡图存的道路。

就在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诞生了一张始终如一地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报纸。

这是一张以特殊的身份出现、用特殊的宣传手法团结和教育广大读者的报纸。

它无论在上海、广州还是桂林，都像一团火，烧穿日寇汉奸用强盗逻辑和奴才哲学聚成的黑云，炙退亡国论者用绝望悲观情绪制造的冷雾，燃亮大众的民族意识，烛照着崎岖而曲折的征途。

这张报纸，就是《救亡日报》。

它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零两个月。然而，它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伟大史册中。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血与火的八十五天	(1)
一、种胎于炮火之中.....	(3)
二、郭沫若归国.....	(8)
三、创刊伊始的一周.....	(13)
四、原子行星模型.....	(16)
五、“把酒持螯咤战云”.....	(23)
六、纸上风雷激荡.....	(27)
七、副刊与特稿.....	(34)
八、最后的时日.....	(39)
第二章 广州十月	(48)
一、再建堡垒.....	(49)
二、留学生与流浪儿.....	(54)
三、确立办报方针.....	(58)
四、兼收并蓄.....	(62)
五、举起新三民主义这面旗.....	(67)
六、宣传与服务结合 宣传与组织结合.....	(71)
七、探索新世界的旅行.....	(77)

八、文艺副刊改版《文化岗位》	(81)
九、再度转移	(84)
第三章 在文化城的氛围中	(89)
一、三而不竭	(90)
二、与桂系精诚合作	(100)
三、《救报》与文化城(上)	(105)
四、《救报》与文化城(下)	(117)
五、讨伐汪逆	(129)
六、乳水交融	(133)
七、反战者，联合起来	(141)
第四章 最后的岁月	(147)
一、人材济济的编采队伍	(147)
二、改革版面 面貌一新	(151)
三、完善经营管理	(159)
四、改变了方针的《十日文萃》	(168)
五、社址疑云	(171)
六、被迫停刊	(175)
第五章 夏衍与《救报》	(183)
一、是革命家，也是文人	(184)
二、政治家办报	(185)
三、也是宣传艺术家	(190)
四、纽带·桥梁·核心	(197)

第一章 血与火的八十五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浩劫。

资本主义经济的恶性膨胀，制造出它的畸形儿——法西斯主义。

在西方，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奉行绥靖政策，对法西斯主义一味姑息纵容，德、意法西斯政权结成的轴心势力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大战一触即发。

在东方，日本法西斯主义兴戎起衅，意欲争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亚洲大陆孱弱不堪，无以为抗，更助长了日寇的凶焰。战争从中国开始了。

当时的中国，权力掌握在一小撮专制主义者手中，为着一己的私利，他们依靠西方帝国主义者，顽固地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维持他们的腐朽统治。他们反对进步，仇恨革命，致使国家贫弱而衰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一九三七年“七七”，只几个回合，日寇的魔爪已伸入中国腹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十五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小队以铁甲车三辆为前导，向上海宝山路中国军队开枪射击。下午三时五十分，日军向我大举进攻，并以大炮轰击闸北青云路、西宝兴路，随后又用燃烧弹焚烧闸北房屋。在

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国军队奋勇还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

从“七七”到“八一三”，芦沟桥的枪声和淞沪前线的炮火，终于使一贯奉行“不抵抗主义”的中国大独裁者蒋介石清醒起来了。如果任凭日本鬼子继续入侵，不仅亿万普通百姓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会危及国民党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危及他们所依靠的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当然，蒋介石也不会忘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骊山上的狼狈遭遇，再不下决心抗战，他的“龙座”能不能继续坐稳也大成问题。

“七七”事变后的一个月，即八月六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程潜、朱培德、黄绍竑、张治中等军政要员出席。会上蒋介石将芦沟桥事变以来的军事形势作了报告，认为平津沦陷，国家命运已到最后关头，亟应奋起抵抗，一致御侮。白崇禧建议，为了团结抗战，一新国人耳目，应成立陆海空军大本营，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对日作战。蒋介石答覆说：当前都是不宣而战，不需另立名目，即以军事委员会指挥作战可也。即日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令他们分途反攻北平、天津。^①

“八一三”事变的当天，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分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

随着日寇的全面入侵，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谈判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并对此作出巨大努力。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赴庐山同国民党商定两党合作的最后条款，起草了《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中共的宣言以及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至此，早已蓄积在广大民众心中的抗日激情喷涌而出，救亡运动的烈火顿成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全国。

《救亡日报》（以下简称《救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刊的。它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产物。

一、种胎于炮火之中

上海，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曾经是左翼文化人的荟集之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就诞生在这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初，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又在上海成立“文化界救国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活动。左翼文化工作者和“救国会”同仁构成救亡文化运动的中坚。

“七七”事变后，上海文化界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不同的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反蒋”逐步转变为“拥蒋抗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上海一百多名文化界人士举行聚餐会，席间，大家忧虑百端，对救亡运动的现状很是不满，纷纷献计献策，希望成立一个文